

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The Problem of Making Soi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Shanghai

羅小茗**

Xiao-Ming LUO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魯迅 [1924]，〈未有天才之前〉）

差不多十年前，王曉明老師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為例》中，將如何在現有體制內開闢空間、保持活力，向其借力而不被其收編，列為在中國大陸開展文化研究的第一道難題。這是因為，雖「反體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之一」，但集權統治之下體制對於資源的高度壟斷、大學在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中的核心位置等現實條件，構成了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在學院內建制的必要性。¹

在「硬著頭皮擠入現行大學體制」十多年後，再來思考這道難題，便會發現，社會整體狀況的急遽轉變、大學體制的變革和文化研究開展的實

投稿日期：2019年7月13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9月23日。

* 感謝王智明老師的邀稿，讓我有機會記錄這一部分的觀察和思考。匿名評審對於此文的認真點評和詳細意見，對於修改本文有非常大的幫助，在此一並致謝！

** 羅小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

電子信箱：manmandu@163.com

1 參見：王曉明。2019。〈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以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為例〉，收錄於《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羅小茗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文章列出的後兩道難題是文化研究如何展開對社會良性變革的動力和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質如何創建。對後兩道難題，本文也有相應的思考，但限於篇幅，不做具體的論述。

airiti

際狀況，已經為這道難題增加了新的條件、限定和補充說明，難題的重心也有所轉移。至此，考察體制在當代社會語境中的準確位置和實際狀態，捕捉反其道而行之的可能與策略，進一步思考文化研究與大學體制之間的關係，促其更深入地在地化，在吸納歐美理論之外形成新的動力裝置，也就變得格外重要。

一、變化後的現實條件

粗略說來，圍繞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建制問題，現實條件的變化在於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是大學體制的日趨固化和善變。表面看來，固化和善變是彼此矛盾的狀態，但就大學體制十多年來的轉變而言，卻形成了一體兩面、齊頭並進的態勢。

2003年，北京大學率先以數量化和核心期刊(SSCI, CSSCI)為導向的學術評鑒和聘任制度實施改革。儘管這樣的方式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爭議，²但整個大學體制——無論是教學改革還是科研管理，圍繞這兩個標準日益固化的趨勢，並未改變。此後，中央、地方乃至大學自身，不斷出臺各種政策措施，處理由改革帶來的新問題。³但總體而言，單一的評價標準不改

-
- 2 部分討論文章收入了甘陽、李猛編的《中國大學改革之道》（2004，世紀出版集團）。事後看來，圍繞北大教改展開的這場大辯論，也是最後一次中國大陸學界不同思想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就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集體發言，形成爭議，並引發社會關注。遺憾的是，這些言論對大學改革本身並沒有形成太大影響。
 - 3 這些問題包括：重視科研而忽視教學，強調數量而忽略質量，教育資源過於集中於部分大學等等。2012年，上海市教委下達《關於開展本市本科高校骨幹教師激勵計劃試點工作的通知》，增設針對本科的教師坐班答疑和晚自習輔導制度；2016年6月，教育部官網宣佈，對新時期高等教育做出新部署，「985」、「211」工程以及重點、優勢學科建設等相關文件失效，統一納入「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2019年2月，「翟天臨事件」後，教育部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1904/t20190412_377698.html 2019/06/11瀏覽）。2019年6月11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http://kjj.jyg.gov.cn/kjgl/kjjh/201906/t20190612_466918.html，2019/06/19瀏覽），旨在整頓學界不正之風、強調科研誠信。從這些意見的頻

變，⁴這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讓大學在固化的方向上越陷越深。

同時，這一唯數量和核心期刊馬首是瞻的制度改革，進一步弱化和掏空了本來就不怎麼強健的學術共同體，導致大學體制不得不越來越善變。當大學忙於應付各類偏於形式的檢查，行政部門以連坐／扣錢／解聘之法懲治教師，以放棄大學的獨立品格、無視教師的個人尊嚴為代價，換取各類好看數據⁵的時候，也就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阻止大學的各個層級，將自身利益——首先是政績好壞、仕途升遷，其次是「免責」與「懶政」——擺在教書育人和生產新知的公共職能之前。朝令夕改之事，變得稀松平常。於是，在量化指標的強光之下，大學體制一方面正變得越發固化僵硬，另一方面，卻也因放棄了教育的基本原則而不斷改弦更張。⁶

其次，當大學體制發生上述變化之時，體制中的學科和研究者的狀況也在變化。在〈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中，項飈通過勾勒知青一代學者的學術踐行，提出了對學術規範化之後學界中人的擔憂：

雖然公務員和體制內學者在2014年以後都反對1990年代末以來的「維穩」政策，但是他們歸根到底是要維穩的。維穩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在課題選題、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維穩」。⁷

頻出台和事無巨細中，可以一窺當前學界風氣之惡劣和問題之嚴重。

- 4 早在1990年代，雷丁斯便指出了其中的關鍵所在：即一旦使用量化考核的標準，就意味著評價學術的權力勢必為行政部門所掌握。參見：Bill Readings（比爾·雷丁斯），郭軍等譯。2008(1997)。《廢墟上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頁30、3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5 在這裡，數據的好看不光是指科研發表和項目經費的數量多少，更重要的是畢業率、就業率、考研率、國際生比例、獲獎和保研比率等一系列大學考核指標的高低。
- 6 長期以來，在鄉村社會的研究中，人們特別關注中國社會中官僚體制自身的變化。比如，歐博文、李連江在《中國鄉村中的選擇性政策執行》便討論了這一變化，指出「一種選擇性的政策執行的模式已經在中國的鄉村中形成。許多幹部盡職盡責地執行著不受村民歡迎的政策，但是卻拒絕執行其他那些受村民歡迎的政策」（<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088.html>，2019/06/20瀏覽）。遺憾的是，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城市社會或相關機構中時，卻少有人關注和研究。一方面，人們意識到「懶政」和「免責」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這些究竟會給城市社會，比如像大學這樣的機構，帶來什麼變化，卻顯得比鄉村治理問題更像是一個禁區。
- 7 其後，項飈準確地指出法蘭克福學派——這一重要的文化研究源頭——的獨立

這一學術生產的實際狀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日益「和諧」與「共情」，帶來了文化研究在中國語境下的特殊挑戰。

它具體表現為，文化研究進入中國大陸20年多來，其挑戰既有學科邊界的難度，遠沒有在西方學界那麼大。這是因為，將歐美理論及時吸收到社會人文學科，是中國學界自198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也隸屬於這一傳統。同時，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社會人文學科的歷史積澱本就不足，新的學科系所在社會需求之下不斷湧現；在大學擁抱市場的過程中，基礎學科又往往被邊緣化。所有這些都使得既有的社會人文學科的內在理念和價值，遠不是那麼明晰有力。至此，將一個學科有力統合起來的，與其說是值得捍衛的學科理念與價值，不如說是由教育部的學科目錄、學術規範、課程考試、學位制度、期刊會議所構成的一整套學科制度。在此過程中，學界中人往往高度依賴於這一系列規範化的制度章程來錨定自身的位置。這使得人們對於體制和規範的敏感性和警惕心持續減弱。⁸特別是，在任何情況下，中國學界都有一個無從反抗的對象——政治審查制度。這一下線的存在，使得其他制度的「不當」色彩，大大減弱。最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社會人文學科內部相對獨立的自我推進的邏輯，尚未牢固確立便被打翻在地。這些身形不定的學科，很難成為持續對話的對手。以挑戰既有學科的「頑固不化」，獲得自身合法性和進步性的文化研究，據此展開演進的動力，也就格外不足。而體制外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的稀缺，又使得文化研究找不到

性：「獨立性確實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20世紀初能夠形成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它的獨立，不是獨立於政治和社會，而是獨立於已經獨立了的學術界。」見：項飆。2015。〈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文化縱橫》2015年12月刊。

- 8 199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體制的感受力和辨別力的下降，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狀況。究其原因，大概是這樣幾類：其一，自1989之後，去歷史化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氛圍，使得「政治冷感」成為青年一代的普遍狀態；而現在，這些青年已經成為社會中堅力量。其二，中國共產黨將自己的定位解釋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其實質是將權力層層包裹在一整套制度程序和治理術之中，顯得不那麼刺眼。其三，自「中國崛起」以來，黨國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為政權的合法性依據，這造成了全社會，特別是思想界、知識界，對於「國家」、「政權」等問題在全球語境下的進一步分歧。這些因素彼此疊加，相互影響，形成了人們對於「體制」，或熟視無睹，或為之辯護。

更好的結盟與對話的對象。⁹至此，這一前進動力的雙重匱乏，構成了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持續推進時的特殊困境。

最後，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現實條件——受教育者，也在發生急速的轉變。儘管事後的追溯往往將一個學科或流派的確立壯大，功勞歸於少數著書立作之人，但實際上，那些對未來有著好奇、對現實有著不滿的年輕學生，他們的生活直感和熱情呼應，對於新的問題領域的形成和學科更新有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表面上看，是老師在開闢新的局面，領著學生往前走；若定睛細看，又何嘗不是學生更本能地呼應著時代的衝擊，以「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方式，催促著老師們前行。

然而，對文化研究來說，這樣的「前浪」和「後浪」之間的推動關係有所改變。作為另類的研究計劃，文化研究從不指望「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卻也期待偌大的中國社會，總有那麼幾條漏網之魚。可惜的是，在一個乍看起來多姿多彩，實質上生活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急速縮減的社會里，這樣的期待越來越落空。¹⁰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不設本科。¹¹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學生經過四年本科的學習，積累了一定的專業知識之後，再來接受以問題為導向的文化研究的訓練。但是，在前兩種變化的作用之下，大學本科教學質量嚴重下

9 因為生存環境惡劣，體制內外的機構或團體，實際形成的是一種抱團取暖、交換資源而非諍友的關係。

10 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養成了將社會希望寄託於青年之上的新習慣。雖「一代不如一代」是每一代人都會有的感慨，但社會在青年身上看不到希望和熱情這件事情，既是百多年來頭一遭，也是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逐漸富裕之後的一個新現象。這並非文化研究獨有的困擾，而是整個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11 2004年，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成立，當時的設想便是不組建文化研究的學士學位課程，只提供本科選課。發展到今天，文化研究系提供給學校和學院的本科選修課程有5-6門。2012年，經教育部審核批准，文化研究成為由上海大學自主增設的二級學科，獲得碩士和博士的招生資格，並於當年正式招生。迄今為止，共招收博士生17人（其中外籍3人），碩士生29人（其中外籍1人，非中國大陸籍1人）。其中，已畢業博士生4人，碩士生16人；博士畢業生多進入大學或研究機構，碩士畢業生除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5人外，多為公務員、媒體工作者和自主創業者。近十年來文化研究系所展開的制度建設和教學實驗的狀況，可以參考羅小茗在〈作為空間的中國大學：來自文化研究的「課堂」觀察〉中的記錄和分析，許寶強編著：《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臺教育研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airiti

降。四年的大學教育，既無力為廣大學生提供相對穩定的專業知識，也不培養他們的好奇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這意味著，一旦進入研究生階段，若說傳統學科的學生還有可能通過加強專業訓練，依照學術規範，依樣畫葫蘆地撰寫論文、換取學位的話，考入文化研究的學生則發現，自己所須面對的挑戰，遠不止於此。這不僅是因為，對文化研究來說，依樣畫葫蘆的「好事」根本不存在，也是因為，就連閱讀和思考都無法按部就班、照本宣科，而不得不在隨時隨地的反思中進行。而這恰恰是一路接受著應試教育的標準答案、習慣了與權威相安無事、事不關己地成長起來的青年，最感不適之處。面對這樣的挑戰，知識儲備、心理能量和思考能力的不足，勢必讓他們在前行時產生更多的畏難情緒，更不容易確立起對自己的信心，更遑論以「後浪」的姿態面對時代了。

至此，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和體制發生關聯的現實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如果說，文化研究一路走來，其在英美諸國獲取進步力量的路徑，在最初的十多年中尚對我們有借鑒意義和實施效果的話，那麼現在，這一路徑已基本失效。站在反體制立場上的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建制問題」，已經由「是否/如何進入體制」進入到了下一個階段，即如何在上述現實條件中，重新確認立場，鎖定對手，裝配起文化研究往前發展的新一輪動力裝置。

二、「文化事實」的累積

不難發現，在這一社會變化的過程中，不管是圍繞大學體制展開的現實，還是更為廣泛的中國社會狀況，文化研究對於「文化」的強調，不僅依舊有效，而且越發關鍵。這是因為，這一對「文化」的強調，直接針對和持續挑戰當前社會體制的運行後果——隨著集權體制—量化經濟—網路技術的套裝的深入，中國社會失去了整體性地理解、把握和克服危機的能力。就此而言，深深的無力感越是包圍著人們，將人撕裂為不可對話、缺乏共識、也無從合作的散兵游勇，將「文化」視為一整套將他們囊括

其中，由生產組織、家庭結構、制度結構乃至社會成員之間的溝通形式等所構成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並對此展開分析，也就越發成爲一個社會展開自我理解，而非將其拱手讓人時不可退讓的據點。對於當下這一種生活方式，觀察得越仔細，記錄得越清晰，分析得越深入，它在歷史長河中的特殊和短暫，也就越發顯豁，被其全然控制的無知和恐懼，也就不那麼容易霸佔人心。

問題在於，面對這樣的現實，文化研究應該展開什麼樣的立足於「文化」的記錄和分析，方能真正佔據要津、牽制全局？在這裡，文化研究的方法需要被重新討論。

一直以來，文化研究主張，根據對現實的判斷和對問題的理解來選擇方法。此處的現實，既非泛泛言之，也不是一般的社會論斷或主流媒體的話語呈現，而是明確指向以完成漫長的「文化革命」爲目標¹²而被持續捕捉，以便展開分析、批判、改進和累積的「文化事實」。¹³這意味著，當文化研究跟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腳步，將展開

-
- 12 雷蒙·威廉斯以「漫長的革命」命名這一文化上的巨變，指出：「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理論上的危機，理解我們的真實歷史或是我們目前的現實狀況以及轉變的條件，那麼就必須始終努力把這個過程當作一個整體來把握，以新的方式視其爲一場漫長的革命。」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倪偉譯。2013(1961)。《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頁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3 在這裡，「文化事實」的命名來自於對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社會事實」的改造，以區別於未經整理的散落於社會之中的各類現實。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涂爾幹在《社會學方法的准則》第二版序言中，再次解釋了在當時引發極大爭議，此後成爲社會科學基礎的「社會事實」這一概念。他強調：「凡是智力不能自然理解的一切認識對象；凡是我們不能以簡單的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一個確切概念的東西；凡是精神只有在擺脫自我，通過觀察和實驗，逐漸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到的標誌轉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層的標誌的條件下才能最終理解的東西，都是物」，而將社會事實視爲「物」來展開研究，承認社會事實的客觀實在性，是其確立自身方法、建立社會學科時最基本的規則。(涂爾幹：《社會學方法的准則》，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7頁。)對文化研究來說，塗爾幹面對爭議時特別強調的「社會事實」的整體性和公共性，是文化研究在確認「文化事實」時無需過多討論的共識。反倒是將文化的改造過程視爲一種需要被物化的對象，重視它的客觀屬性和由此而來的延續性這一點，需要更多的討論來澄清。然而，自文化轉向以來，建構主義的思路已經深入人文學科的骨髓。對於「文化事實」的建構過程所具有的客觀性、物質性和可供檢驗的可能，又往往因爲文化研究總拒絕成爲一個學科，因此也不介意其研究對象是否區別於其他學科而具有獨特性，而被大大忽視了。

文化分析的目的確認為促成良性文化的完成之時，如何以文化之名，將那些隸屬於文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或傳播學等等的現實材料，經由整理、分類和解析，使之成為「文化事實」，由此納入文化革命的視野？如何確認在這一過程中，被如此分析的「文化事實」，其所具有的客觀屬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延續／斷裂和累積？如何對這一收集、分析、研究的過程展開檢驗和反思？這些都構成了需要仔細討論的方法上的問題。因此，就在體制內展開的文化研究的學術工作來說，其步驟勢必包括：首先是捕捉、辨別和整理一部分的社會現實，將其整理歸納為「文化事實」，其次是從良性的社會文化生產的角度，就這一事實展開分析和判斷，最後才是據此做出相應的診斷、建議和進一步的理論概括。然而，就目前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而言，這三個步驟之中，最為薄弱、令人犯難，也最不被重視、缺乏討論和思考的是第一步。¹⁴

仔細分析的話，文化研究的第一步之所以邁得如此艱難，源於這幾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中國速度」的指引下，社會空間迅速變遷，網路技術日新月異，審查制度更是日益苛嚴。所有這些都使得，無論是在實體還是虛擬空間中，散落各處看似經濟技術實則發揮著重塑心智的文化作用的現實，其效用越來越強，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而留存的時間越來越短。未經整理的文化現實的隨時消失，已經成爲一種常態。¹⁵人們還未來得及從文化的角度展開甄別和評價，形成「文化事實」，並由此生成「選擇性傳統」，它們便已經過時和隱形了。¹⁶比如，就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進行的「都市

14 粗看之下，這和文化研究最初是以一種西方先進理論的面目進入中國大陸學界有關，實則不然。真正的問題在於，爲什麼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始終盤旋於最初的階段，而無法進入下一個階段。大學體制固然是其成因之一，但對於方法討論的匱乏和籠統，卻是文化研究的自我認識的問題。特別是，當這一步——「文化事實」而非別種類型的現實的捕捉、辨別與整理，實際上是很難通過籠統地向別的學科——無論是社會學、人類學還是政治經濟學——學習具體的方法，自動完成時，更是如此。

15 在這裡，還不止是指以「404」的方式大聲宣告的即刻消失，更多的是在人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的悄然不見，以至於看起來從未存在過。

16 一個現成的例子是微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它歷年來的版本更新記錄。其中，引發爭議的更新和它的更新頻次比較起來，數量是極少的。比如，2018年

青年居家生活調查」來說，十多年前在城市中心還隨處可見、到處聳立的巨幅樓盤廣告，已經銷聲匿跡。日後，人們雖可以從報紙和影視劇里，找到「居家生活」的興起和成為強勢文化的只言片語，但這一曾大規模覆蓋城市的文化事實，卻已經被後續的城市空間充分內化和迅速抹除了。¹⁷再比如，1998年被認定為中國大陸網路文學的起點。僅僅20年之後，人們再來回顧這一歷史時，最大的感嘆便是網路文學作為研究對象，其滅失的速度何其驚人。¹⁸

顯然，政府部門、資本和媒體對積累和保存曾經發揮過作用的文化事實，興趣不大。甚至於，他們努力的方向恰好相反，那就是不斷重組現實，以便讓某一種片刻的文化看起來「永恆」與「唯一」。這種操縱現實的做法，使得人們活在越來越短促的當下。社會記憶被不斷破壞、拼貼和重組，只能以一種悠遠的文化懷舊的面目、作為此刻的裝飾品出現，而不具備與當下這一種現實展開辯駁的能力。¹⁹

其次，對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而言，這個文化事實未經整理便過快消失的問題，一直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對於那些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特別是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由主流媒體推到人們眼前的社會熱點，文化研究是否需要和如何及時關注？予以關注、展開研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對文化研究的學徒們來說，這一困擾是非常直接的。一方面，他們的日常生活浸潤在媒體世界之中，社會熱點往往牽動著他們的興趣。及時思考這些文化現象，對此發言，是文化研究特別鼓勵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發現，實際做的似乎不過是用「文化工業」、「消費社會」、「新自由主義」或其他

對於朋友圈「三天可見」的議論。

17 2019年5月31日，文化研究系「數碼文化與社會」碩士課程的總結討論。

18 見：何平。2018。〈行將隱失的證詞〉，《熱風學術（網刊）》2018年冬季刊。顯然，這一出現和消失，不光是狹義的作品內容，也包括它是以何種技術手段呈現。

19 熟悉網路技術的人也許會說，只要在網路上存在過，那麼就一定可以找到。的確如此。但問題在於，人們必須先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麼，才能在網路信息的海洋上較有信心地出發，展開「IT考古」。而這種尋找和重組「文化事實」的能力，恐怕又是技術無法代替人來完成的。

剛學會的理論名詞批評一通，好似一場換湯不換藥的練習。²⁰更經常發生的事情是，等他們好不容易做了一番研究，覺得可以發聲的時候，社會熱點早就移到了別處。這樣的經驗，難免讓人感到疑惑和寂寥。

在過去，對於這樣的困擾，通常的回答是，這些五花八門、時時翻新的文化現象背後，是一整套1990年代後逐漸形成的支配性文化生產機制；通過對它們的調查和研究，來勾勒這一背後的機制是有意義的。這樣的回答雖正確，卻回避了文化研究在捕捉和整理文化事實時因速度和標準而遭遇的挑戰。前者表現為，與文化相關的現實總是消失得過快而文化研究的反應總是「顯得」過慢，而後者則是，捕捉和記錄的判斷標準，到底由什麼來決定。

實際上，上述困擾蘊含的是在捕捉此起彼伏的文化現實、將其確認為「文化事實」時的第二重難度，即文化研究是否有自覺和有可能從「理想的文化」的角度，建立起記錄和判斷現實的相對獨立的節奏和標準？特別是，當今天的經濟活動大規模以文化之名展開，文化往往被高度擠壓進經濟和政治的維度之中，難以自成一體的時候，更是如此。而在一個整體把握能力嚴重受損的社會中，這一難度，無疑是大大增加了。就此而言，一味向社會學、傳播學或政治經濟學要求方法上的輸入，不僅無助於文化視角的形成，反而會模糊這一問題，讓其被海量的數據、信息和概念淹沒。

第三重的難度，來自於研究者個人近乎無意識的情緒和態度：對於當下此刻的現實的不耐煩、輕蔑和逃避。這樣的情緒和態度，恰恰是在第一部分所討論的現實中逐漸養成的。認為現實糟糕，並有更好的社會狀態可以追求，是文化研究的起點。但當代中國的社會語境和大學體制顯然以此為起點，規劃了多條逃逸路線，使得人們從批判現實出發，或通過高深的理論或通過半古的史料繞道而行，離現實越來越遠。這其中又有幾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在逃逸路線的映襯之下，認為對於當下的認真刻寫和努力爭奪，是無意義和不值得做的，「不是學問」。一種是充分認識到當下很

20 《視界》是1990年代末21世紀初在中國大陸推動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第7輯中，在發佈一組本科生的文化研究論文的同時，《視界》刊出曠新年對文化研究的批評文章〈文化研究這件吊帶衫〉，批評文化研究的套路化嚴重。可見，這個問題從一開始便存在。

重要，但因整個教育和學術的訓練都是教人對當下袖手旁觀的，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著手才好。第三種則介於兩者之間，搖擺不定。

如果上面的分析大體不錯的話，那麼，這些困難實際上也為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待確認的共識：

首先，對於文化現實的爭奪、命名和保存，是「文化事實」得以形成和持續積累的前提，也是文化研究想要在中國現實中確立自身時不可回避的基本任務之一。這是因為，在當前的社會狀況之下，對於文化事實的整理、保存和累積的工作，既是文化研究對現實擺開自己的態度，形成言之有物的批評的基礎，也是其拉開與權力 / 體制 / 資本的距離，通過保存不同的社會記憶和現實類型，形成自己的問題領域和思考節奏的依憑。

其次，進一步的文化研究「建制」工作——從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到評價方式，也應該圍繞加強文化研究爭奪和積累文化事實的能力、建設相配套的學術平臺而展開。這是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將文化研究反體制的立場，更具體地落實在體制之內需要思考和推進的議題。

最後，對於運用當前的學術體制培養什麼人的設想，也由此進一步明確。那就是通過聚焦於上面這一基本任務，吸引不知道怎麼辦和仍在猶豫的後兩種人，更踴躍地加入到對文化事實的刻寫和保存之中。而這一對人的培養，顯然不限於為大學體制輸送教師，也包括在各類文化事業之中、同時參與此項任務的畢業生。

可以說，越是意識到在當代中國最終騰挪定義「文化」的權力之手，越是充分理解到左右著上述難度的決定性力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真正需要嚴肅思考、認真籌措的，是正視上面這些困難，為文化研究開足馬力捕捉、定義和整理「文化事實」，制定更加實際的戰法。

三、「考現」的共識與方法

以上述任務來打量既有的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特別是上海大學文化

研究系的工作，便會發現這樣兩個不足。

首先，全系上下，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其展開學術研究、理解資料的方式，仍是頗為個人的和「學術」的，或者說是遵從既有的學術規範的。儘管文化研究從不看重數量，也不對核心期刊另眼相待，但這兩點「否認」，只是對既有的糟糕制度做減法，²¹而非「別立新宗」。雖然我們有當代文化研究網和《熱風學術（網刊）》，來發佈和保存所有無法被「知網」化的論文與文章，但其取捨的標準，仍不脫學術觀點或批評意見的範圍，而不涉及對於文化事實的記錄、保存和積累。對於已經展開了研究的文化事實的保存、公開和共享，更是闕如。

仍以之前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調查」為例。此項研究的最終結果，是發佈論文和出版一份十萬字左右的研究報告，供相關的研究者和有興趣的人閱讀。雖然研究是在拍攝大量的實地照片、大規模收集住房廣告和相關政策、整理近1000人的問卷數據和20多組訪談的基礎上，得出上述報告和結論，卻從未想過應該將這部分的文化事實的資料，充分檔案化、數據化，從而保存、分享，供後來這一問題領域的研究者使用。²²而這項研究所針對的文化事實的不保存 / 不公開，將導致兩個後果。一是研究觀點，特別是對於現實的歸類和看法，變得難以檢驗和接續。二是，這樣一來，由這項研究努力開闢出來的新的問題領域，也就很難有真正的積累和認真的推進。

實際上，對於這一點更有直覺的，反而是學生們。回想起來，在碩士學位論文中，各類現場照片、網路截圖、數據地圖，作為可視化的證據，越來越多地出現。但作為證據進入論文，最終進入「中國知網」的畢竟是

21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又何嘗不是對於此刻當下的不耐煩、輕蔑與逃避的一種表現。這種態度常常表現為對於制度的單純的否定或「回避」，而非更積極地反其道而行之的建設。這也許是因為，在這個體制內浸泡得越久，人們就越容易把單純的否定想象成一種建設。

22 這當然可以說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轉移到文化研究之中時，研究方法的慣性所致——現當代文學雖有版本學，但沒有如此迫切地保留「文化事實」的問題。但如果仔細推究的話，又何嘗不是對於當下的傲慢和對於「觀點」的過於看重所導致的文化研究方法上的盲點。

少數。如何讓大量的在調查和研究過程中被辨別出來的「文化事實」——它們顯然經過了從文化的角度展開的初步分類、整理和加工，得到更加系統的保存和分享，成爲一種有意義的累積和貢獻，如何呈現使之得供後來者檢驗、思考和接續，則是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其次，文化研究在學術評價方式上，過於看重對現實的看法或創見，卻對分類保存和積累文化事實這一部分的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就對於創新的偏愛而言，文化研究和當代學術體制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基本同構。在這樣一種評價方式之下，文化研究的學術工作，變得神秘起來，而非與現實展開短兵相接的、非常實際的勞動過程。但實際上，離開了第一步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創造。唯有真切地認識到什麼是「舊」，方有可能準確地把握到與之相對的「新」。在教學和指導論文寫作的過程中，這種評價方式上的厚此薄彼，則更直接地表現爲，學生們寧願躲在圖書館裡讀理論，也不願意展開實際的調查研究；又或者，明明做了很多實際的調查研究，卻因感覺不到它有價值而更加焦慮。這當然是因爲整個學術體制都在暗示他們，前者才是更重要的。但同樣也是因爲，明知如此，文化研究卻沒有更明確地修正這一評價方式，也沒有給出更切實的行動方向。

好在只要意識到這兩點不足，對文化研究有利的現實條件和相應的改進措施，也就有可能隨之湧現。

最基本的一點便是，今天的年輕人對於網路技術的親近感、接受和學習能力，遠遠高於非網路原住民的前輩。無論是利用網路上大量的免費軟件和小程序，分析網路直播和彈幕評論，還是將其運用到實體空間之中，對於文化事實做數據記錄、分類和保存，都是他們擅長的部分。如果能夠在文化研究的課程設置和講授上，打破「文科生可以不懂技術也不需要掌握新的網路技能」這一類的惰性觀點，鼓勵他們這一方面才能的學習和發揮，那麼，他們對新事物和新現象的熱情，不僅有了用武之地，由此而來的獨特能量也將被大大激發出來。

第二，充分利用既有的學科制度，改變文化研究對於學位論文的指導

和評價方式。也就是說，不僅要在課程設置中加入對於如何收集、保存「文化事實」的技術、方法的學習和討論，教學相長，更要在學術論文的寫作中予以明確的要求，確保它的完成和呈現。這意味著，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將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對象的相關資料的數據化和檔案化，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對於其所研究的「文化事實」的分類整理和理解思路，另一部分才是基於這些資料的後續分析和深入思考。

第三，對於後一部分的論文，「中國知網」會予以保存，²³教育部會加強抽檢。而對於前一部分的論文，文化研究則鼓勵在當代文化研究網上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予以保存和分享，以留待後來的研究者們使用、檢驗、比較和更新。

如果上面這些有利條件可以被充分運用，相關措施可以真正落實的話，那麼，將可能進一步改善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處境。

這首先是因為，隨著文化研究內部評價方式的改變，將文化事實充分數據化和檔案化的能力，實際上構成了青年一代獨特的「後浪」優勢。就各色文化現實展開的將其更好地分類、保存和分析的學習過程，使得他們可以和老師之間形成真正的對話關係，而非一邊倒的「受訓」。以檔案化、數據化的最新技術為媒介，以文化事實的保存為目標，代際之間、同儕之間相對良性的彼此對話和挑戰的模式，有可能逐漸形成。

其次，當這一文化事實的保存和積累得以展開的時候，文化研究也就獲得了新的動力裝置。在這一動力裝置中，它的對手是任意展布著現實的權力，它的研究對象，是在這一任意展布的過程中，不斷變化和形塑人們的心智結構的文化事實與權力邏輯。它得以前進的方式，是對於這一持續變化的對象孜孜不倦地保存、分析、分享、檢驗和更新，從而為獲取整體

23 因寫作本文的需要，我在知網上查詢了本系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收錄狀況，意外地發現，知網對此的收錄似乎並沒有什麼規律可循。箇中原因不得而知，但並非文化研究系所有的研究生論文都可以在知網上搜索和下載到，卻是可以肯定的。而從研究生教務部門得到的回答，則是他們也沒有文化研究系所有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名單可供查詢。至此，雖然本系的歷史並不長，但這一部分的資料和信息，卻已經開始消失了。

性的把握和理解能力做積極和沉著的準備。通過這一裝置，文化研究者們的努力，在被「中國知網」和大學評鑒體制分解成一篇又一篇僅以引用率串聯起來的學術論文的同时，也將高度聚焦於對文化事實的集體保存、積累、思考和建設之中。

最後，當這樣一個文化事實的保存、積累和分享平台開始出現的時候，圍繞這一目標和理念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也將變得更有可能是因為，這樣的保存、累積和分享，既無法靠個人，也無法僅靠一個系所單槍匹馬地完成，而是需要說服、吸引、帶動有著相當共識、願意以相類似的方法展開學術操作和知識共享的人們協力完成。這一共同體的初步目標，便是分辨和積累當代中國的文化事實，使它以相對完整的面目得以保存，作為此後人們對這一時期的文化類型和功過是非，展開比較、評價、反思和批判的檔案依據。而一旦如此，那麼這部分工作的是非曲直、功過好壞，也就擺脫了當代大學限時限刻的評鑒標準，擁有了自己的歷史坐標。相信這一點，對於很多學術中人，會有不小的吸引力。

也許有人會說，這不就是把研究資料以數字化的方式公開出來，根本不是什麼新玩意。的確如此。早就有人將自己的研究和所有的資料搬上網站，實現共享。不過，這些做法往往被視為研究者的個人興趣和方法，而非文化研究發展的整體方向。而這也是把這樣的步驟，作為文化研究「建制」來談論和推動的意義所在。也許有人會說，把文化研究定位於對「文化事實」的蒐集、整理和積累的工作，這樣的定位和期待太過悲觀，竟好像是在做最壞的打算。的確如此。好在這個時代，最不缺的就是悲觀。我們卻也希望，上述思考可以讓今天的悲觀適得其所，實現它們的價值。

還記得，初入文化研究的天地，我曾把它想象成一場整裝待發的華山論劍。後來才慢慢發現，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華山。於是，便常常想起文章開頭所引的魯迅的這段話，覺得文化研究需要的，不是不斷立志發願，出發去不存在的華山，而是大家一起，就地來做土的沉著和耐心。在那段文字的後面，魯迅接著寫道：

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里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